谷歌眼镜上午“直播”骨科手术

市六医院主任医生陈云丰网上被“围观”

今天上午10时25分，市第六人民医院骨科陈云丰主任医师继续他的第N台“桡骨远端粉碎性骨折切复内固定手术”。唯一的不同，是他的鼻梁上“多”出了一副高科技眼镜。

“因为它可以他的‘第一视角’，详实观察到操作的所有细节；而我们可通过它传至云服务器的画面，‘第一时间’同步看到他手术的全部过程。是这样吗？”隔着手术室几幢楼距离的科教楼内，记者询问一起看着实时直播的骨科专家。

“呵呵，其实现在远不止我们几个在看哦！”市六医院副院长、上海市创伤骨科临床医学中心主任张长青教授，指着屏幕上清晰的手术创面说，此时此刻，在上海、香港、新加坡以及欧洲多个国家，不少医生也正通过个人电脑、平板电脑或者手机，“收看”陈医生的手术直播呢。

素以“中国断肢再植摇篮”之称享誉海内外的市六医院骨科，目前保持着每年2万多台的超高手术量。同时，作为国家级重点学科及上海市重中之重建设学科，这里承担着繁重的学术交流、临床教学任务，并有大量来自国内外的同行前来学习、参观，每年数以万计。手术实况转播，自然成为一个重要手段。

今天上午市六院骨科手术首次采用谷歌眼镜直播现场 本报记者 **张龙** 摄

在骨科主任柴益民教授眼里，传统的手术转播通常面临着很多制约。一方面医院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进行组织，另一方面，转播设备又往往受手术室洁净度要求、拍摄空间等等限制，很难采集到最能体现手术价值的内容。“即使是能通过无影灯下摄像头或者内窥镜转播手术的一体化手术室，由于视角的差异，也无法完全展现外科主刀医生的手术技巧。”

高科技谷歌眼镜的问世，为外科医生带来了另外一种可能。愿意创新的市六医院骨科，希望借助新“眼镜”，跨越之前遭遇的技术瓶颈，让手术直播变得更真实、更便捷、更节约、更广泛。只要有网络，人们完全无需再组织集体观摩。甚至是错过了直播时段，也能事后再从网站上在线收看。

从患者右手腕部掌侧切口入路——充分暴露骨折断端——骨折复位——钢板内固定。陈云丰主刀的手术一如既往地轻车熟路，波澜不惊。外加的“眼镜”直播任务，也显然没有让陈医生感觉有额外负担。而在现场的记者注意到，无论近在咫尺或相隔万里的手术“围观者”中间，做手术的也好，做“眼镜”的也罢，此时一定是将更多的关注投射在了这场手术直播的“有效性”上。

“如果观摩医生与主刀医生之间的语音和图文能够顺利双向交互，专家教授就可以打破地域限制，真正实现远程医疗会诊以及远程手术指导”；“如果眼镜真能实现‘人机交互’，主刀医生也就可以通过这种简单的穿戴设备，在现场即刻查获有用的信息资源，提升手术质量”……第一次尝到了利用“眼镜”成功进行手术视频直播的市六医院骨科，下一步将目光放在了与开发商讨论实现“眼镜”交互功能的途径上。

这也许是合作双方对“眼镜”手术直播更美好的共同期待。

本报记者 **施捷**

没有人口买家 就不会有人口贩卖

农民工代表周振波提议案推动修订刑法

周振波是一名农民工，也是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。今年3月，他提交了一件代表议案，被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确认为正式立法案。

本报记者 陈正宝 摄

“拐卖妇女儿童是极端恶性犯罪，不但要依法严惩拐卖者，也不能放过了买家，所以，我将提交议案，建议修改刑法第241条，请各位代表附议！”今年3月，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开幕前，上海代表团酝酿代表议案，全国人大代表、上海德力西集团变压器制造公司车间主任周振波陈述完毕。

此时，全国人大代表、上海市检察院检察长陈旭向周振波竖起了大拇指。这个细节，令记者印象深刻。此后，这件30人联名附议的议案，被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确认为正式立法案，刑法第241条的修订由此纳入立法视野。

从农民工到全国人大代表，1年内提出高质量立法案，这样的效率不多见。上周，市人大常委会走访在沪全国人大代表，周振波的经历引来大家热议。回放一位农民工代表对刑法第241条的“较真”，不难管窥基层人大代表的履职新气象。

提案获得快速附议

今年3月4日下午，北京京西宾馆，上海代表团酝酿代表议案。

大会议室里，围成3圈的代表坐椅顺次排开，会场中心是一架麦克风，代表们依次走到麦克风前，介绍自己的议案。周振波第一个上场，接下来的3分钟陈述，很重要，只有说服别人同意自己的观点，才能赢得联名附议——依照全国人大代表提交议案的规则，每件议案达到30人联名附议，才有资格提交大会确认是否成为正式议案。

人口拐卖，是社会危害极其严重的犯罪，1997年以来，我国刑法已修正8次，刑法对人口买卖一直采取严厉禁绝态度。目前，拐卖儿童犯罪，已经形成了一道产业链，这条产业链的终端就是“收买家庭”，如果没有最终的收买，前面的贩卖就失去了绝大部分“价值”。刑法第241条对收买方的处罚是：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管制，如果对被买儿童没有虐待行为，不阻碍对其进行解救，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。这样的法条和司法现状，给人的一种印象就是：在人口买卖的这条产业链上，刑罚似乎重“头”轻“尾”。

“对收买方处罚过轻，并不利于抑制犯罪。我要套用一句姚明在动物保护公益广告中的宣传语——没有买卖，就没有杀害——对于被拐卖的婴儿来说，没有买家，就没有贩卖。所以，刑法第241条有必要修订，加大对买方的处罚力度！”

周振波代表的3分钟陈述，引来了陈旭代表的“大拇指”和众多代表的频频点头。人们发现，周代表已不再是去年那位心情激动、爱说“做梦都没想到能当上全国人大代表”的“新人”了，1年里，他的履职水平进步可观。

年纪轻轻当选代表

周振波原本是河北广平县的一位农民，当过兵，退伍后继续回乡务农。2003年，他经人介绍到上海打工，如今，他是上海德力西集团变压器制造公司车间主任。

2013年，37岁的周振波当选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。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选举的最大特点，是首次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，实现了中国式民主又一次重大进步。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，即每一全国人大代表代表相同的城乡人口数，约每67万人分配1名代表名额。2013年，2987名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中，来自一线的工人、农民代表为401名，占代表总数的13.42%，较十一届提高了5.18个百分点。

总想着为农民讲话

2013年3月，新代表周振波出现在上海代表团，常常一身工作服，这工装几乎成了一种标志，他说，没错，他代表一线农民工！

上海代表团向中外媒体开放，他声音洪亮，说农民工的求职渴望：亟需政府部门建立一套用工信息平台，及时收集、准确发布企业用工需求，别让全国各地的农民工东奔西跑“撞大运”。

在小组审议时，他问：政府能否为农民工提供保障性住房？9年义务教育后，农民工子女能否留在大城市继续学业？

在小组审议时，他还说：“我不知道该不该讲，但我是代表农民工的，一定要讲。在一些偏远农村地区，政府下拨的救济金被挪用，甚至进了个人腰包。老百姓不敢反映，也不知道找谁反映！”

不知道找谁反映？周振波就以全国人大代表的职务身份向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反映“来自基层的声音”。他原本就生活在基层，与基层有着天然联系。而在周振波看来，人大代表沉到基层，接地气，才会有见解出思路。

上海德力西集团是一家民营企业，很自豪自家出了位全国人大代表。周振波出去调研，企业会为他配备专车，但更多时候他骑助动车，他说，“企业的钱，我能帮着省，就不乱花，这也是人大代表的素质。”

凭着“接地气”，周振波迄今提交了6份书面意见和1份立法案，“跟刑法第241条较真，也是因为走基层听到不少受害家庭的痛苦，我想，要改变，总得有人提出来，我是人大代表，我提！”周振波没想到，这份抢眼的议案让他成了“明星”。

“人大代表就是人大代表。明星不明星，那是别人说的。我只在乎能不能多干点人大代表该干的事。”周振波说这话的时候，是今年8月6日，他正赶在去市人大常委会信访办查阅人民来信的路上，天很热，他更是风风火火。

本报记者 **姚丽萍**

江桥经济城
上海北虹桥商务新丰地
招商电话：59116308 59116108
公司地址：华江路129弄7号楼4楼
自贸区富特北路33号212室 电话：51966826